

山東大學文史書系

中国诗史

●陆侃如 冯沅君 著



山东 大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史/陆侃如等著 . —2 版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8 (2000.8 重印)

ISBN 7-5607-1447-1

I . 中…

II . 陆…

III . 诗歌史 - 中国

IV . 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508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新华书店 经销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1.5 印张 55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2 版 200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7000 册

定价：34.00 元

出版说明

陆侃如先生，1903年生于江苏省海门县。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192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先后任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中文系主任、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东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7年后到山东大学任教，曾兼任图书馆馆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山东大学副校长等职。陆侃如先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1978年在济南去世。

冯沅君先生，1900年生于河南省唐河县。她于1917年考入我国第一所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读中国古典文学。1925年后，冯沅君先生先后任教于金陵女子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1947年后长期执教于山东大学，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文联副主席，1974年在济南去世。

陆、冯两先生于1929年在上海结为伉俪，1935年又双双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两人都是新中国的一级教授，又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的副校长。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研究生涯中，两位先生携手共进，潜心向学，一生著述甚夥，在学术界影响颇巨。陆侃如先生自20岁出版《屈原》一书开始，先后有《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古文学系年》、《宋玉》、《楚辞选》、《楚辞选译》、《刘勰论创作》、《文心雕龙选译》、《文心雕龙译注》等重要著作问世，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为世所公认。冯沅君先生早年曾从事创作，她的小说集《卷葹》、小说随笔集《劫

灰》等在 20 年代的青年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誉。从事文学研究之后，她撰写的《古优解》、《古剧说汇》、《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和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等，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中国诗史》外，陆、冯两先生合作撰写的文学史著作还有《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其中前者被论者称为“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后者则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俄、捷克和罗马尼亚文版，成为我国解放以来唯一的一本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中国诗史》是陆、冯两位先生合作推出的第一部文学史著作。作为中国诗歌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本书在 30 年代一问世即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反响，鲁迅先生就曾将陆、冯的《中国诗史》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一并向人推荐。解放以后，作者又对《中国诗史》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先后由作家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今，在进一步校勘整理的基础上，我们将此书作为“山东大学文史书系”之一种奉献在读者的面前，并以此作为对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的纪念。

山东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1995 年 11 月

目 录

上卷 古代诗史	(1)
第一篇 诗歌的起源.....	(3)
第二篇 诗经.....	(6)
第一章 导论.....	(6)
第二章 三颂	(19)
第三章 二雅	(31)
第四章 十一国风	(45)
第五章 二南	(68)
第三篇 楚辞	(74)
第一章 导论	(74)
第二章 楚辞的起源	(79)
第三章 屈平	(94)
第四章 宋玉.....	(113)
第五章 附论古逸.....	(123)
第四篇 乐府.....	(134)
第一章 导论.....	(134)
第二章 郊庙歌及其他.....	(144)
第三章 鼓吹曲及其他.....	(162)
第四章 相和歌及其他.....	(171)
第五章 附论南北朝乐府.....	(185)
中卷 中代诗史	(217)

第一篇 三国诗	(219)
第一章 导论	(219)
第二章 五言诗的起源	(225)
第三章 建安诗人	(238)
第四章 曹植	(254)
第五章 正始诗人	(271)
第二篇 六朝诗	(281)
第一章 导论	(281)
第二章 元康诗人	(286)
第三章 陶潜	(298)
第四章 元嘉诗人	(312)
第五章 新体诗人	(323)
第三篇 初盛唐诗	(340)
第一章 导论	(344)
第二章 初唐诗人	(357)
第三章 王维及其他	(367)
第四章 岑参及其他	(376)
第五章 李白	(385)
第四篇 中晚唐诗	(385)
第一章 导论	(385)
第二章 杜甫	(390)
第三章 韩愈及其他	(404)
第四章 白居易及其他	(417)
第五章 其他诗人	(429)
下卷 近代诗史	(441)
第一篇 唐五代词	(443)
第一章 导论	(443)
第二章 词的起源	(447)

第三章	晚唐五代词人	(460)
第四章	十国词人	(474)
第五章	李煜	(501)
第二篇 北宋词		(511)
第一章	导论	(511)
第二章	宋初词人	(516)
第三章	苏轼及其他	(524)
第四章	周邦彦及其他	(536)
第五章	晏几道、秦观等	(548)
第三篇 南宋词		(555)
第一章	导论	(555)
第二章	辛弃疾	(561)
第三章	刘过、朱敦儒等	(569)
第四章	姜夔	(577)
第五章	史达祖、吴文英等	(583)
第四篇 散曲及其他		(594)
第一章	导论	(594)
第二章	马致远、冯惟敏及其他	(600)
第三章	张可久、王磐及其他	(619)
第四章	梁辰鱼、沈璟及其他	(643)
第五章	附论小曲歌谣等	(653)

上 卷

古 代 诗 史



第一篇 诗歌的起源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也有灿烂的文化。就诗歌方面讲，第一部伟大的作品，当推《诗经》。《诗经》的年代虽不能十分确定，但大体上说，其中包含的诗歌距离现在总在三千年左右了。可是中国诗歌的起源，还远在《诗经》之前。《诗经》既然是一部周代的诗选，所以我们就把周代以前（公元前 1066 年以前）的时期算作诗歌的起源时期。

《诗经》以前的古诗歌，大都收集在杨慎的《风雅逸篇》、冯惟讷的《风雅广逸》及《诗纪》前集十卷《古逸》里。其中有神农时的《蜡辞》（见《礼记·郊特牲》），有黄帝时的《弹歌》（见《吴越春秋》），《有焱氏颂》（见《庄子·天运》），《游海诗》（见王嘉《拾遗记》），有少昊时的《皇娥歌》（同上），《白帝子歌》（同上），有唐尧时的《击壤歌》（见《论衡·艺增》），《康衢谣》（见《列子·仲尼》），有虞舜时的《卿云歌》（见《尚书大传》），《南风歌》（见《家语·辩乐解》），《虞帝歌》（见《尚书》），有夏代的《涂山歌》（见《吴越春秋》），《五子歌》（见《尚书》），《夏人歌》（见《韩诗外传》），有商代的《盘铭》（见《礼记·大学》），《桑林祷辞》（见《荀子·大略》），《商铭》（见《国语》）等等。这些作品，有的可能是真的，但在后人追记的时候不免有些改动，有的可能就是后人伪托的。它们既然真伪难分，我们也就无所依傍了。

在这里，考古学上的发现与发掘，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历

代出现的青铜器，上边的铭文是可贵的史料。不过《殷文存》里所收七百多件中不免杂有别的朝代的器物，所以卜辞的发现就显得更重要了。在1898~1899年间，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地方，有农民在耕地时无意中挖掘到一些龟甲兽骨。起初被古董商人运往北京，辗转到了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等人手里；后来经过孙诒让、王国维和其他学者们的研究，知道这是盘庚至纣王时（公元前14至前11世纪）的遗物，上边刻的是商卜的文辞。渐渐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出土者多达六万多片。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根据卜辞来推测一下盘庚到周初的情形。

我们先谈一谈殷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当时畜牧是相当发达的，观用牲之数多至一百以上可知。后世所有家畜的种类，这时差不多已全备了。同时，农业也很进步，农作物的种类颇多。农耕用的器具一般是木制的耒耜，其他用具已经有铜器，但还没有铁器。手工业的种类不少，而且分类很细。商业也已经存在。在这样物质生活的基础上，产生了音乐和舞蹈。“舞”字作“𧈧”，王襄在《簠室殷虚征文考释》里解释道：“象两人执旄牛尾而舞之形，为舞之初字。”《吕氏春秋》叙古代的乐舞，曾说：“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古乐篇》）北美印第安人也有一种“野牛舞”。本来劳动必先于游戏，原始舞蹈只是生产行为之意识的模仿而已。这些舞蹈大都有具体的目的，殷人的舞蹈大都用于祈雨。“乐”字作“𦨇”，罗振玉在《殷虚书契考释》（卷中）里说：“从丝在木上，琴瑟之象也，或增‘𦨇’，以象调弦之器。”这已不是原始的简陋的乐器了。卜辞中讲到的乐器，还有鼓、磬、簴、磬、和等，殷人的石磬现在还存在。由此可见当时的音乐和舞蹈是相当兴盛的。

现在我们可以研究当时的诗歌了。诗歌在发达的最初的阶段，是和音乐与舞蹈密切结合着的。在卜辞中既然看到音乐与舞蹈的盛况，就可知道那时必然有不少的诗歌。但是因为没有立刻用文

字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不容易研究了。在卜辞中间，有一段很像是当时的歌曲：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这几句载在郭沫若的《卜辞通纂》里（第三七五片）。体裁很近于汉乐府的《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上边引的“其”字表示疑问，到《诗经》里还有“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的句子。这首简单而朴素的古歌，恐怕是我们诗史上年代最早而又最可靠的作品了。

在殷商金文中，没有协韵的。周代却有不少，见于王国维的《两周金石文韵读》与郭沫若的《金文韵读补遗》中。其中年代较早，可以算是《诗经》中《雅》、《颂》的先驱的，有武王时的《大丰殷铭》。这篇有各种释文，今采用一种：

乙亥，王有大丰，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尤王。殷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丕显王则相，丕肆王则唐，丕克三殷王祀。丁丑，王飨大房，王降亡得爵复饋。惟朕有庆，敬扬王休于降享。

此外，还有成王时的《矢令殷铭》，昭王时的《宗周钟铭》等等，内容不外祭祀与战争，形式方面则四言与杂言各半。这类作品大都不甚高明，成功的杰作却有待于《诗经》。

第二篇 诗 经

第一章 导 论

在研究《诗经》以前，我们先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诗经》的来源，一是《诗经》的分类。

先论《诗经》的来源。

要明了《诗经》的来源，须先辨明采诗与删诗两种传说。采诗之说始于汉代。一见于《礼记》（《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再见于《汉书》：

春秋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卷三十《艺文志》）

三见于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句）：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这些传说大约来自《国语》（《周语》上）所载邵公的话：“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然而采诗说究有几分可信，则颇成问题。

崔述在《读风偶识》（卷二《通论十三国风》）里说：

余按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大抵汉以降之言诗者，多揣度而为之说。其初本无的据，而遂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无复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于有宋诸儒，甚且以后汉人所作之序，命为周大史所题。古人已往，一任后人之加之于伊谁，良可慨也！

他说采诗出于后人的“臆度”是很对的。这种臆度显然是从汉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上推想出来的，以为汉既如此，周亦当如此。却不知道这种臆度在《春秋》和《左传》里都找不出一点根据。

大师采诗固然是臆度，然而汉人对于今本《诗经》却又认为非大师之旧，是经孔子删过的。《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
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关于这一点，拥护与反对者甚多。其实删诗与采诗同样的无稽，今引方玉润的话于后：

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

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夫曰“正乐”，必《雅》、《颂》各有其所在，不幸岁久年湮，残缺失次，夫子从而正之，俾复旧观，故曰“各得其所”，非有增删于其际也。奈何后人不察，相沿以至于今，莫不以“正乐”为删诗，何不即《论语》诸文而一细读之也！（《诗经原始》卷首下《诗旨》）

崔述也说：

孔子删诗，孰言之？孔子未尝自言之也，《史记》言之耳。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是诗止有三百，孔子未尝删也。学者不信孔子所自言，而信他人之言。甚矣，其可怪也！（《读风偶识》卷三《郑风》）

孔子在古籍中最喜言诗，见于《论语》者有十八次之多，故删诗的传说易于发生。司马迁或者根据这种传说，或者误会了《论语》“正乐”的意义，都不足凭信。

以上辨明采诗删诗二说之无稽，其次要推论《诗经》真正的来源。先引崔述的话：

盖凡文章一道，美斯爱，爱斯传，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传者。但世近则人多诵习，世远则渐就湮没。其国崇尚文学而鲜忌讳则传者多，反是则传者少。小邦弱国偶遇文学之士录而传之，亦有行于世者，否则遂失传耳。（《读风偶识》卷二《通论十三国风》）

这是很近情理的推测。上文曾说，汉人采诗之说大约来自《国语》的“公卿至于列士献诗”，采诗虽不可信，献诗却是可能的。所谓“献诗”，即崔述所说“文学之士录而传之”。这些录而传的诗，汇集起来便成《诗经》。

何休说：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句注）

这就是《诗经》所包含的作品。这些作品后来谱之管弦，成为乐章。我们曾说删诗之说来自《论语》所载孔子正乐之事，正乐便可证明男女所歌者业已入乐。顾颉刚在《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古史辨》第三册下编页608～657）里举许多证据说明三百篇均入乐，徐中舒在《幽风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里也证明“《诗经》为鲁国工歌之底本”。从季札聘鲁观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及韩宣子“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的话看来，今本《诗经》传自鲁国是很可能的。

这部民间男女所歌，公卿列士所献，而经鲁国师工谱为乐章的总集《诗经》，经秦火而至汉初，传者有三家：鲁之申培公，齐之辕固生，燕之韩太傅。后来又加上古文的《毛诗》，与今文的《鲁诗》、《齐诗》、《韩诗》并传。三家亡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过三家的遗说及字句的歧异，还可考见一部分。这是三百篇来源及流传的概况。

其次论《诗经》的分类。

关于《诗经》的分类，有两个问题须先讨论：一是六义，一是四始。《毛诗序》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六义之说本《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四始之说本《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关于六义与四始，二千年来不知产生了多少辩论。对于这些无甚意义的辩论，我们可以抛开不理。我们还可以说，六义、四始只是汉儒的庸人自扰。要了解这一点，须先证明《二南》的独立。

《二南》独立问题的发端是由于《小雅·鼓钟》第四章末两句的解释：

以雅以南，以箇不僭。

此处“南”字究竟指何物，至今无定论。第一个说它指《诗经》中之《二南》者，为苏辙的《诗集传》。这个解释是否可信，那是另一问题。其影响所及，则使南宋初年两位学者——王质与程大昌——都把“南”当作独立的体裁，以为可与《雅》、《颂》并列。王质在《诗总闻》里把三百篇分成南、风、雅、颂四部分，说：

《南》，乐歌名也。见《诗》：“以《雅》以《南》。”见
礼：“胥鼓《南》。”郑氏以为西南夷之乐，又以为南夷之
乐。见《春秋传》：“舞《象箇》、《南箇》。”杜氏以为文
王之乐，其说不伦。大要皆乐歌名也。(卷一《闻南》
一)

程大昌在《考古编》里也说：

《鼓钟》之诗曰：“以《雅》以《南》，以箇不僭。”季
札观乐有舞《象》、《箭》、《南箇》者，详而推之：《南
箇》，《二南》之箇也；《箭》，《雅》也；《象舞》，《颂》之
《维清》也。其在当时亲见古乐者，凡举《雅》、《颂》，率
参以《南》。其后《文王世子》又有所谓“胥鼓《南》”者，
则《南》之为乐古矣。……不胜传习之久，无敢正指以
为《二南》也。(卷一《诗论》二)